

第一章 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考察

在人类历史上，每个民族都留下了光辉而又璀璨的一页，都有过流传久远的民族精神，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和更替，一些古老的文明古国，诸如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国家都相继衰落，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曾在现代世界上辉煌一时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在其存在 74 个春秋之后，失去民族凝聚力而分崩离析。然而，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风云变幻，饱尝百年血雨风霜，经过无数个朝代更替，面临过无数次的内困外扰，经受了无数次的文化冲击、武装征战，却依然坚如磐石，岿然独存，保持着强大而坚韧的民族凝聚力；近二十多年来，实行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再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那么，为何如此民族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华民族能经风沐雨、自强不息而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何中华文明、民族精神从未间断而能一脉相承、联贯绵延、与时与世俱进？换句话说，为何中华民族有如此巨大的聚合力、凝聚力、同化力？为何中华文明能包容、吸收外来文化使其变为中华文化；偌大的中华民族、偌大的中华疆域、各地区风土人情各异、语言又有不同，但却能拥有一种共同文化、保持一

种统一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观。回答这些为什么便是中华民族自身独具的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依托这种精神和物质力量，中华民族才得以长盛不衰，绵延不止，从兴旺走向发达，从后进走向富强，实现历史跨越和升腾。然而，这样的回答根据何在？让我们先从民族凝聚力、价值观形成的内在结构和外在框架说起。

一、民族凝聚力发生的自然 框架和历史成因

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民族凝聚力通常蕴涵着二重性：一重是外在的、历史的、地域的或带强制性而形成的具有外在因素的内聚力量；一重是内在的、文化心理的。人们世代相传、互相沟通、互相吸引的精神内聚力量。这两重性统一于历史和社会凝聚的活动中，并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通过民族成员的活动表现出来。

民族凝聚力的自然因素，即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血缘（亲缘）关系。社会因素，即包括物质经济、政治力量和政治制度、优秀文化。这里我们得先从民族凝聚力生成的自然环境讲起。

不难理解，任何民族活动都要有生存空间，要有物质基础，自然地理环境所展现的空间便是这样的物质基础。用列宁的话来说：“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①顺着这种思路来观察中华民族，我们感悟到，中华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459 页，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

民族凝聚力滥觞于遥远的氏族社会末期，那个时代，生产力十分低下，地理空间给先民们生存以独特的影响。你看，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中华大地，它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西北有浩瀚的沙漠，西南矗立着地球上险峻的青藏高原，这是一个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内部有着完整的体系、结构，形成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在这个独特的单元中，中华先民们散居在一个从西向东的倾侧的斜坡的平面中，东接横断山脉，海拔下降到 1000—2000 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其间有塔里木及四川盆地。再向东是海拔千米以上的丘陵和海拔 200 米以下的平原。东西落差形成显著的三级梯阶 南北达 30 个纬度，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给中华先民们以限制，又给他们以良好的生息繁衍的机会。这三级的生态梯阶，就自然山川和人文状况来说 亦可称为界限不太严谨的九个区域 即河西走廊、西域、河套、塞北、漠北、东北、云贵高原、青藏高原、中国本部。这“三级”、“九域”为中华先民们较为固定的生息的一片土地 也为它们的迁徙奠定了条件，更为先民们的文化形成造就了相对独立的地域环境。

中国版图像一片平静的海棠叶，台湾岛和海南岛像镶在叶柄下方的两颗巨大珍珠，南中国海诸岛，则是无数散落在碧绿海水中的珍珠群。

中华民族就在这样美丽的空间降生、成长、凝聚。

这种自然框架使中华民族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华先民们经过迁徙主要生活于黄河、长江沿岸。这里气候宜人 土地肥沃 为农耕定居、吸收非农业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 因而生活相对比较稳定，民族的繁衍也就取得了相对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当然，与一些单纯过游牧生活的民族、海上漂移的民

族有鲜明的反差。游牧民族与海上民族大多漂泊不定，迁徙流移，对外扩张，军事征战，海外殖民，因而他们难于形成一种永不间断的凝聚力。相比之下，中华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封闭的大陆型的地理环境，土地肥沃，风景宜人，河流纵横，地势平坦，是理想的农耕地带。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较好的自然地理框架，成为华夏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这一近乎与外界隔绝的半封闭型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生成、发展及其特点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民族性格、审美情趣。由于中华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的自然优越性很容易产生一些快乐、满足感；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从事的农耕劳作，一方面产生了中华先民的热爱乡土（故里、祖国）、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反对暴政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无形中也形成了喜内聚、慎升迁、崇尚宁静、安定生活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从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善良称著于世，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之一。这就是古书上所写的“中华先民们有‘兼爱’、‘非攻’、‘礼运大同’的民族意识。他们热爱乡里——祖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每当他们失去宁静或家园遭到蹂躏时，又会表现出深沉的爱国情感和强大的凝聚力。”

第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生成，其腹地为“九州”。在这里，首先是作为凝聚核心的华夏先民们聚合成族。华夏先民发源和生活的地方是中国的本部，即传说中的禹划分的“九州”（这里包括七个小区，即中原、河东、关中、陇西、江淮、巴蜀、江南）。华夏先民（即后来的汉族）占有天时和地理环境的自然优势，在被称作“九州”这一地区，河湖密布，平原和山地相间，属北温带内陆气候，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天然生长农作物的农耕区。在这片农耕

土地上，可以说天赐厚土、五谷丰登，农业文明迅速崛起。华夏先民们对农业耕种极为重视，拓荒开地，播种庄稼，不断取得农业丰收，这就吸引了周边非华夏亦即非汉族的族群迁徙这里，共同开发、农耕。由于种植谷物、驯养家畜的农事繁多，中华第一个王朝^①——夏专门设立了“稷”来管理农业，夏王朝之后商、周各代，仿效夏的做法，同样设置了专门管理农业和监督奴隶的官员“小藉臣”“小众人臣”。由于农耕业绩日渐发达、劳作事务与日增多，于是有了由炎、黄、东夷三个部落联合而聚合的华夏族雏型，并在与周边各部落的竞争中逐渐呈现优势。在不断吸收周边族群，融合、征战周边各部落基础上逐步形成华夏族。

由于华夏族起源于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这样便于耕作的地区，华夏的农业生产很快由分散进入集约式的经营，即很快出现了“井田”制生产。而“井田”制出现，一方面表明了一种土地制度的产生，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农业的集约式的劳作经营方式，它使阡陌之间连成块块的农田，便于精耕细作。这种集约式的农业经营方式的出现，表明华夏先民们已从远古的洪荒时代向前推进了一步。换句话说，原始的中原的农业发展，使华夏族在文明演化中，比较快地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周边各部落心向往之的凝聚中心。从社会活动上说，当时北方的狄戎族群在征战中不断受到同化，南方的楚国、吴越等向南发展，并将争霸目标指向北方中原。当时各族的征战，显示出南方各族对中原文明的向往，中原的华夏族，除在农业上占优势外，正是利用它所辐射出来的吸引力不断融合各族群壮大、发展成为汉民族的。

据《中国通史纲要》(第 52 页)称 按传统说法 夏从禹开始 到桀灭亡 共有十四世，十七王，经历了四百多年，约相当于公元前 21 世纪或稍早一些直至公元前 16 世纪。

第三，抵御自然灾害，治理水患使华夏各族进一步凝聚在一起。华夏族的形成进而汉族的形成，是在原始农耕中、农业生产发展中形成的。这种原始农业生产自然是靠上天恩赐，即先民们靠天吃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摆布。每遇到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便民不聊生，瘟疫横行。从公元前 23 世纪到公元 20 世纪的 4000 多年间，黄河曾发生过 1500 余次的小缺口和 7 次大缺口、7 次大改道。而每次缺口、改道都是一次大灾难，致使饿殍遍野。为了改变这种悲惨状况，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古代，除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水患外，别无他求，于是，治理水患便成了联结华夏各民族的纽带。流传最广的便是大禹治水的佳话了。从《尚书》到《吕氏春秋》等先秦古籍都对大禹的功绩交口称赞。史称尧舜时期洪水泛滥，民不聊生，禹的父亲鲧受命治水无功，被杀于羽山。子继父业，禹继续率领中原各族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①，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②，终于制服了洪水。

治水的活动，使中原各部落、各族群走向更加紧密的联盟。黄帝时期，炎、黄、东夷三部落就已形成了华夏族的核心，而治水活动的扩大，使中原大多数部落卷入了这一活动。这就使华夏族核心进一步扩大，进而使部落联盟不断扩大，小的部落逐步融入以炎黄为核心的中原集团。于是，华夏族就在此基础上诞生。

第四，部落征战是形成民族融合、凝聚的重要途径。民族凝聚的形成，不仅有人们战胜水患而联合起来的因素，同时又有各部落间征战、联盟的因素；在部落征战联盟中形成特定的民族，华夏族由雏型而生成为定型的民族便是史证。

^① 《史记·夏本纪》。

人们知道，在远古时期，在我们祖国境内出现过难以胜数的氏族和部落，它们可称为中华民族现存的各民族的直接祖先。在中国本部，这些部落最大的大致有三个集团^①：一是炎黄集团，包括传说中的五帝；二是东夷集团，包括太昊、少昊、蚩尤和羿；三是南方的苗蛮集团，包括伏羲、女娲和槃瓠（后作盘古）。华夏族是以中原炎黄集团为基础，融合了东夷一部分夷人集团（主要是蚩尤、少昊这一支）和南方一部分苗蛮集团而形成的。这种融合，除农业劳作、治理水患而联合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激烈的战争完成的。比如，古老的炎帝和黄帝部落之征，即阪泉之战，以黄帝的胜利而告终，炎帝部落被并入黄帝部落，接着黄帝部落又与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部落开战，蚩尤被杀，东夷部落被兼并。这三个集团合并是华夏族形成的关键性一步，成了华夏族的基础和核心。

在后来的尧舜时代，也展开了一些周边部落的征战，但规模不大。到了夏商朝代，同样爆发了一系列的征服周边部落的战争，如武丁伐鬼方，长达三年之久，鬼方终于被征服。到武王伐纣时，他所率领的是一支由各部落（庸、蜀、羌、鬻、微、纣、彭、濮等）组成的联军。灭商战争使这些“蛮夷之邦”先后加入了华夏族的阵营。

西周初年，又经三年战乱，击败“三叔”叛乱及东方以奄、夷为首的各个部落，并分封了齐、鲁等国于东方作为周之屏障。整

在徐炳昶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也例举了创三集团说。即炎黄集团，以炎帝、黄帝为代表，出于西方陕甘黄土高原，后来顺着黄河东进，而分布于华北一带，是后来的华夏族的本源。风偃集团，即太皞（风姓）少皞（嬴姓，嬴同偃）之后裔，散布于淮、泗、河、洛之东方平原，蚩尤出焉，是后来东夷诸侯族所在；苗蛮集团，为南方民族，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

个东方各族最终融入了中原华夏族。西周的演进、兼并与融合标志着华夏族的最后形成。以后又经春秋、战国、秦汉的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作为民族主体的汉族。可以说，中华民族凝聚力生成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前身——华夏族（主要是汉族）形成过程。因为华夏族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多种民族融合、凝聚，各民族部落兼并、扩张的过程。

极而言之，自春秋时代的夷狄交侵，至战国的混战，而后才有秦汉的统一；自秦汉不断奋战，再经魏、晋、南北朝的胡汉角逐，然后有匈奴、鲜卑、羌、氏、羯的归宗，自隋、唐的南北征讨，及五代、宋、元长期拼战，才换得突厥、铁勒、高丽、吐蕃、党项、回纥、吐谷浑、契丹、女真及若干蒙古人的认同，又经明朝、清朝的对抗及努力，方才结合成了以汉、满、蒙、回、藏、苗为主的中华民族。可以说今天由 56 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凝聚与融合才逐步形成、壮大的。

第五，语言文字、中原文化、汉字的凝聚效应。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语言上的不同，常常造成民族间的隔阂。语言上的相同则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凝聚、聚合。在我国，早在商代，其中原地区就有了文字，周朝和商朝的文字基本上是统一的，都以方块字为文字标志，当时正是这种方块字发挥了极大的凝聚效应。当时中原的周边各部落，如巴、蜀、吴、越、楚，也在战国时期先后接受了中原华夏族的方块文字，可以说，起源于象形文字和记事符号的中国方块字，是世界文字的独特现象，它不像古腓尼基人和一些欧洲人，使用拼音文字，因拼音不同而导致民族分隔、分离、疏远，而方块字能透过各式各样的单音节的方言土语、象形和记事符号，把不同部落的人群聚合起来；各种族人群虽不相同，但有了方块字的沟通，通过它的可感知的视觉形象可以变异为同，把不同情感、

情趣的人粘合起来；或通过可感知的视觉形象，激发人们的灵感，在人们的心理上增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亲近感；人们看到方块字，仿佛是他乡遇“故知”。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分裂的岁月，但方块字却能使各族人群保持大致统一。方块字多为汉族所使用，方块字的力量效应也就是汉字的魅力。汉字的形成，结束了中华民族“结绳而治”和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的历史，它把方块字推进得更为完善、更为辉煌。从文字学上说，汉字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其概念意义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表现一般概念意义，即通过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某种概念，一是蕴含其中的深层意义：表现汉族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正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表现中，它发挥出更为丰富的凝聚效应。在中华深层的文化积淀中，有来自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等多种文化外在因素的影响，又受到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等深层文化心理的制约。汉字的深层表意功能所蕴含的文化学意义及文化结构的多种形态，构成如文化学家帕默尔说的：“汉字是中国文化脊梁”。

汉字，对中华民族来说，犹如长城一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心灵中的第二道长城，发挥着无可比拟的凝聚效应和功能。汉字，除了具有传播功能，确证功能（以文字来证明文化：如证明一个朝代统治的合法性；给人们思想行为提供某种规范，被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镜象功能（凝结着一定文化信息，作为“密码本”承载超出时代的信息，以字推证名物，以字析看文化变迁），更为显著的是它有表现功能，即汉字的形体具有激发和表现民族情感的独特功能，亦即通常所说的“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具有激活民族思维的魅力，从而对中国人的认识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人的情感超越时空而产生亲近感。

应该说，在民族聚合、融合过程中，方块字——汉字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效应。然而，在民族聚合中，不论古代或现代，更大的凝聚效应属中华文化的辐射。

在古代，华夏族的文化辐射表现为华夏文化圈逐步扩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融合、聚合常常通过“文化的同化”和“民族的融合”实现。

中华古代文化表明：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契机，中国本部即中原的炎黄集团从一开始就处在文化领先地位，并一直保持了这一地位，经夏、周两代千余年的孕育发展，到西周已形成了同民族经济、政治相适应的形态及其载体——华夏文化。

华夏文化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它以迁徙、聚合和民族征战为中介，将华夏文化带到周边“四夷”各族，辐射四面八方，同时又不断吸收周边各族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经过长期不间断的双向反馈、互动、融合扩展，使华夏文化不断扩大。

夏王朝的建立，形成了华夏文化第一个稳定的孕育时期，文字、语言、典章、制度、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初始”的发展，开始了部落吸收华夏文化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高峰时期，同时也是华夏文化呈现辉煌的年代。诸子百家各呈其能，文学、哲学、史学、自然科学、军事科学（思想）政治学说都在这一时期争奇斗妍，结出丰硕成果，奠定了古老中国灿烂文化的基础。华夏文化在诸侯长期争霸战争中逐渐形成了规模不等的文化辐射中心：南方的楚文化；北方的燕文化，后起发展的秦文化，等等。由于文化的辐射，先后将西方的羌、氐、巴、蜀等戎狄带入了中原文化；将今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少数民族部落文化融入华夏文化。春秋战国是华夏文化连锁反应般的辐射、膨胀、融合交汇的时

期，为后来的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原文化的辐射自然引起华夏文明范围的不断扩大，原为中原腹地一块小小地方的“华夏”，众多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部落，已变成不断向外扩展的、疆界难以界定的大部落。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征战，经过它的第一个文化“黄金时代”，经过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华夏文化融合不间断地发生，使华夏界线向外扩展；到秦始皇灭六国，华夏文化俨然以华夏正宗身份入主中原，建立起第一个空前庞大的封建帝国。昔日东方之夷、南方之蛮、西方之戎狄，全部融入华夏文化的巨流。时至秦凿灵渠、通五岭、征南越，华夏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到珠江流域。华夏族势力不断扩大和中原文化的辐射面拓宽，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长。

第六，汉族的初步形成及其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特殊贡献。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 200 多个民族，而其中，汉民族始终是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民族，始终是整个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就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即元、清两代也不例外。汉民族的形成和定型对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挥和拓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籍记载，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其前身就是华夏族。而华夏族，如前所述，是由三个族群集团融合而形成雏形，复经春秋战国、边疆民族内迁和黄河、长江两大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族群大融合达于大认同，形成了华夏民族。秦始皇的统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在秦汉长达四个多世纪统一的条件下，诸夏族群消除了一些明显分割和差别，被边疆各民族先后称为秦人和汉人。南北朝时，汉人进而把他称与自称统一族称——汉族。

应当看到，由华夏族演化为汉族，不仅是称谓改变，而且是民族结构、规范、素质上的巨大变化。如果说，春秋以前，“华夏”一词表示民族和地理称谓，那么，经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华夏”的内涵已进一步扩展，经过秦汉四百多年的大统一，中国版图进一步扩大，百越和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先后融合于华夏族。尔后，融进了许多周边部族的华夏族，发展成为统一的汉民族。

从西汉到南北朝时“汉人”“秦人”称谓演化可以看到汉民族专有族称的意义：西汉时，华夏族仍按先秦传统自称为“华夏”或“中国”，而边疆其他少数民族则称其为“秦人”或“汉人”。这种民族间的称谓，在汉朝灭亡后同样延续。到南北朝时期，“汉人”由他称变成自称。于是，“中国”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称谓，“汉人”成为汉民族专有的族称。

汉族主要从事农耕，自然地聚居在适应农作物生长地区。除了西北若干绿洲农业区和雅鲁藏布江河谷农业区，凡是适宜农耕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几乎全是汉族聚居区域与当地民族共同的聚居区，并在这个区域构筑了以汉族为主体的血缘凝聚的纽带。这种血缘纽带为民族的认同、聚合打下了深厚基础。随着历史超越古代、走进近代，汉族人口日渐于大中城镇和交通要道集结，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构筑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骨架。汉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起着领先与主导的作用。

第七，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价值观之依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除了上述自然框架、汉族生成、部族征战、抵御自然灾害、语言文字和文化辐射等等因素外，更主要的源于精神的、文化的内在原因，即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必然受到中华民族精神、民族价值观的制约、引导。这里所谓中华民族价值观指的

是，中国人对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选择态度，所体现的是中国人行为的自主性、对事物的评价和对自己行为的定势。它既是中华民族行为作出决定的根据，又是民族行为实现的指南（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作出详细的阐明），是民族凝聚力之底蕴。在广义上说，它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联结在一起，这些传统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升华并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并体现在中国文化心理和大众的行为方式之中。这就是 1997 年 11 月 1 日江泽民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的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凝聚力价值观，也就是依托于这些传统，因为这些传统也就是中国人在最高理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价值选择：

其一，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直接制约着民族凝聚力的生成。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华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江泽民同志说：“团结统一，深深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中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暂时的分裂现象，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①。就是说，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

其二，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是支撑民族凝聚力坚不可摧的力量。中华民族的成长历史表明，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历来把独

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载《文汇报》1997 年 11 月 2 日。

立自主视为立国之本。江泽民同志说：“中国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近代中国虽屡遭列强欺凌，国势衰败，但经过全民族的百年抗争，又以巨人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这充分说明，中国人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①自然，它也是支撑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坚不可摧的力量。

其三，爱好和平是珍惜民族凝聚之宝。江泽民同志说：“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的思想 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②。中华民族人口众多 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 有过暴力、征战 但暴力始终不是中华民族凝聚和发展的主要力量，主要力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这种文化精神便是爱好和平。中华文化中，儒家所主张的仁、爱、“和为贵”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映。如果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那么 同样可以说 爱好和平、以“和为贵”为中华民族凝聚之宝也。

其四，整体至上、自强不息的价值观是激励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华先民们早就有融“天”、“地”、“人”为一体的整体思想。孔子、孟子重视道德修养，最后也还是为了实现一致与和谐。整体思想最高发展就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③。就是说，自古以来，我们的先人就以重视整体格局，强调整体存在不注重个人利益而著称于世。与此同时，“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以此作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

^② 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载《文汇报》1997年11月2日。

《礼记·礼运》。

神力量。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结果。^① 我们的先哲在强调自强不息时，同时强调“刚毅”。“刚毅木讷近仁”^②。告诫人们要不畏困难、不怕逆境，乐于在逆境中磨练，方能培养刚毅品格。在这种价值观激励下民族凝聚力量长盛不衰、绵延不绝。

其五，恋土归根的爱国情结是维护和强化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兼容天下，恋土归根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广阔胸怀和执著的乡土意识——爱祖国意识。这种意识不被所处时间、空间所隔绝，不因时间久远而泯灭。中国人不管身居何处，“心总是中国心”总是怀恋自己的故土，总是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有着炽热的感情。这种爱祖国的情结成为促使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在外族入侵时能团结一致，奋起抵抗，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这样的文化心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自然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中华民族凝聚力，如同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从其生成的平面上说，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自然框架下形成的。它产生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心理之中，是在民族价值观导向下形成的。然而，作为特定范畴它又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发展着的，有一个生成、演化、发展的过程。

① 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载《文汇报》1997年11月2日。

② 《论语·子路》。

二、价值观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基础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开放系统，有着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文明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伴随西周社会的发展，诸子百家各示其说，文学、哲学、史学、自然科学、军事思想、政治学说等等，均有建树，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华价值观和民族凝聚的框架，为以后中华文明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进入汉唐之后，封建经济又为民族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提供了物质基础，标志着中华民族在价值观和凝聚力上又有了新发展，其特征是：

1. 在文化基础上，诸子百家重视群体凝聚的意识开始成为统治意识

它的表现形态是：诸子百家都有极高的政治参与意识。历史文献记载：“周秦之际，士之治道方术者多矣。百家之学，众持异说，各有所出，皆有所长，时有所周。虽然，阴阳、儒、法、刑名、兵、农之于治道，辟犹橛之于盖，辐之于轮也。”^①就是说，诸子百家政见各异，但其理论目标，都在论证“治道”，借以维护社会秩序。不仅如此，诸子更强调政治参与、政治实践。儒家孔子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②孟子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③墨家主张兼爱、非攻的

刘文典：《吕氏春秋集序》。

① 《论语·子路》。

② 《孟子·公孙丑下》。

政治学说，其弟子直接参加宋国的反侵略战争。法家更是以实行政治专政、推进社会变革为宗旨，导演了各国的变法活动。即便是道家，也并非与政治无涉。老子归隐，不过是在实现“小国寡民”政治理想无望的情况下，政治热情扭曲化的表现，庄子更有“应帝王”的种种设计。这就是说，从周代开始，诸子百家已意识到政治因素推动社会、促进民族凝聚的作用，此为民族价值观和凝聚力发展的特征之一；之二，是诸子百家都高度重视道德伦理的凝聚作用。孔子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仁为思想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知、智为认知手段。孔子讲的所有这些，都是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从人的内在自觉、外在的行为规范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合关系，亦即凝聚关系。它以“亲亲”为出发点、推及“尊尊”、“孝悌”、“忠信”。孟子更将孔子道德学说条理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墨子分析“天下大乱”的起因说：“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①道家也注重伦理探讨。老子反对儒家的仁义忠孝说教，却倡导“贵柔”、“知足”、“不为天下先”、“不争”等道德信条。法家以严峻冷酷著称，但也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常道”^②。管子更以“礼义廉耻”为民族精神的“四维”（四根支柱），认为“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③。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所提出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价值观走向辉煌的一页，成为民族价值观发展的重要基源。

① 《墨子·兼爱上》。

《韩非子·忠孝》。

《管子·牧民》。